

大河之北

红色篇(下)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俯瞰平山新农村村。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上接第九版)
“子弹”已经上膛,何时才是它的最佳发射时机?
第一套人民币作为一套战时货币,它的发行与解放战争的推进息息相关。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顺利推进,平津解放为期不远。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

人民币这颗“子弹”也迎来了最佳发射时机。

“配合军事上的转折点,经济上,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要作为全国统一的象征,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金银币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永远埋进历史的垃圾堆,开启中国货币史上唯一统一的时代。”崔仁斌说。

1948年12月1日,就在位于石家庄现在的中华北大街55号这座小灰楼里,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并宣布发行“伍拾圆”“贰拾圆”“拾圆”三种面额票券。

当天上午9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科将新印刷的第一批50元券人民币交付给前来取款的平山县银行,人民币正式发行、流通。人民币所到之处,公营贸易公司和商店事先都调拨来花色品种齐全的商品,人们用新发行的人民币买到了足额的生活物资。

就这样,虽然没有贵金属储备,但人民币依靠稳定的物资供应和政权信誉,在河北站稳脚跟,走向全国。

奉献

典范:三地展品背后的“深厚伟力”

在位于今天邯郸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仓库里,保存着一条麻质大绳。

绳子长50多米,褐色,绳面光滑。这是一件藏品,也是抗战岁月里八路军和人民唇齿相依的见证。

1942年5月,涉县庄子岭村的农家妇女李才清正是用这根绳子,将54名伤病员拦胸、拦腰绑住,拖拽到村后山腰间50多米高的山洞里,使他们顺利逃过了日军的疯狂“扫荡”。

在敌人近20天的轮番“扫荡”中,面对日寇的刺刀威胁,甚至被放火烧房子,李才清一家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直到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老人面对当地宣传部门的采访,仍对当年的事守口如瓶:“不能说,组织上交代的,杀头也不能说。”

李才清被党和政府授予“八路军的母亲”称号。在腥风血雨的抗战岁月里,燕赵大地上活跃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母亲”:

在太行山脚下,平山下盘松村,面对鬼子的“扫荡”,“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让负伤的八路军双脚踩着她的肩膀向上攀爬,安全躲进山洞;在冀中平原,安平报子营村,“冀中子弟兵母亲”李杏阁用嘴为伤员吸吮脓血;在雾灵山深处,兴隆达峪村,“麻利嫂”张翠屏临产前带着三百多名八路军紧急转移,在冰上产子……

河北省的老区占到全国老区的十分之一,几乎每个老区的村庄,都有过为抗战无私奉献的革命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给奋战在敌后的干部、战士送饭送水,照顾转移伤员,侦察报告敌情……她们每一个人都是“子弟兵的母亲”——“娘”,这曾是子弟兵对她们共同称呼,起初是为了避免暴露,后来却是发自内心的呼声。

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位于今天唐县军城南关的晋察冀烈士陵园,北侧平台处有一个长30多米的碑廊,呈东西方向排列矗立着十通碑刻。汉白玉石碑上,整齐地镌刻着2528名唐县籍烈士的名字。

“这些烈士中,有1300多人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唐县政协原副主席席宗健介绍,在抗日战争期间,时有人口18万的唐县,有7385名优秀青年参军入伍,2664名干部南下北上。

而唐县,只不过是河北众多县市中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是八路军最稳定的兵员补充基地。到抗战胜利,晋察冀所属正规部队由3000余人发展到32万人,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90万人;晋冀鲁豫所属正规部队由9000人发展到30万人,民兵发展到40万人。

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一册冀中区行署教育科于1941年4月14日编印出版的老课本——高级小学用《政治常识》第二册。

由于当时边区印刷条件简陋,老课本使用的纸张大多为民间自己制造的“土纸”,图案字迹不甚清楚,装帧简单。但泛黄的纸张中,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浮现着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身影。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大地上村村是堡垒,人人是战士。

工教会、农教会、青教会、妇教会、文教会、儿童团和自卫队……根据地里,几乎任何一个人都有组织归属,创造出一整套适合于人民战争需要的后勤保障、兵员补充、伤员救护、敌情侦察、通信联络等作战保障工作系统。

“晋察冀的组织,简直是神秘微妙、不可思议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互传信息,传递抗日军所要的消息,而且传递的速度,比电报、电话还要‘快速’。”在大龙王之役缴获的日寇文件中,敌酋桑木师团长就曾这样哀叹。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屏障:三把植苗锹的“瘦身”

在今天的塞罕坝展览馆,陈列着这样三把植苗锹:

为首的一把形似我们常见的铁锹,锹头和锹柄都由生铁制造,锹头宽厚;

其后的第二把锹头大小相仿,不同的是,锹柄改为木质,锹头顶部两侧突出,更方便踩踏;

第三把锹头变细变窄,形似“长矛”,锹背上还焊接了横梁脚踏板,手持轻便,入土锋利。

植苗锹,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最不起眼、却又应用最广的植苗工具。在115万亩有林面积中,塞罕坝逾半林海都是用植苗锹一锹一锹种出来的。

植苗锹,见证了塞罕坝几代建设者科技兴林的探索,也浓缩着塞罕坝人为京津重塑生态屏障的一路艰辛。

“创业初期,第一代建设者连一把合适的植苗锹都没有。”指着橱窗中锹头已经氧化变黑的第一把植苗锹,林场林业科科长范冬冬介绍,第一代植苗锹名为苏制克洛索夫植苗锹,还是当时林业部的领导到苏联考察不远万里给塞罕坝带回来的。

但“远道而来”的植苗锹很快便遭遇了“水土不服”。

相比苏联人,当年的中国人身形瘦小、力气较小;当时苏联造林地普遍土质松软,植苗锹很容易插入土中,而塞罕坝立地条件差、砂石多。克洛索夫植苗锹并不适合坝上造林。

这把“抡不动”“铲不进”的植苗锹,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映照着塞罕坝的创业之艰。

摊开一张河北地图,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接的地方陡然升高,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台阶分割出上下两种地貌。

这个台阶就是塞罕坝,海拔1010—1940米。天地造化,使这里的森林成为阻挡北方风沙南侵的天然要冲,但高纬度和高海拔也令这里冬季寒冷漫长,最低气温-43.3℃,年均无霜期仅64天。不仅寒冷,塞罕坝风沙还异常大。当地有句谚语称,“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

独特的气候与地貌,也让塞罕坝在全国造林行业,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

建场初期,林场的树苗都是从外地引进的。1962年,林场种植了1000亩树苗,到了秋天,发现成活率不足5%。1963年春,塞罕坝又种植1240亩树苗,成活率也不足8%。

“后来人们知道,树种和苗木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在调运中,树苗失水、伤热,且适应不了塞罕坝气候造成的。”范冬冬介绍。

怎样摸清塞罕坝的“脾气”,在这片土地站住脚、扎下根,是摆在塞罕坝第一代建设者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林场前两年连续造林失败使一些职工心灰意冷,林场“下马风”甚嚣尘上。这时,老书记王尚海、场长刘文仕、副场长张启恩、王福明,反而把全家老小从北京、承德和围场,搬到条件极度艰苦的塞罕坝。

“军心”稳定后,塞罕坝第一代建设者从改进育苗方法和造林机械入手,从科学技术上寻找前期造林失败的原因,开始了一段自力更生的创业史。

植苗锹的“瘦身”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章节。如果说第一代植苗锹见证了创业之艰,第二代更加轻便的植苗锹则见证了苦干实干的激情。

一份刊载于1966年《林业实用技术》、署名“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生产办公室”的文章《落叶松植苗锹》中记载:林场自使用新式植苗锹后……原来每3至5人一组流水作业,用锹、镐平均每人每天栽250株树苗,改用植苗锹后,1人平均每天可栽植600株。

塞罕坝人对这个速度仍不满意,植苗锹被不断改进,它的身形越变越窄,头也越来越尖,第三代植苗锹应运而生。它单脚轻踩便可直插土中,而狭窄的缝隙,更利于防止树苗根系透风跑墒。

配合植苗锹的改进,塞罕坝人独创“三锹半人工缝隙植苗法”,比行业通用的“中心靠山植苗法”造林功效提高一倍,同时能节省造林成本,该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

一锹一锹,五十多年如一日,塞罕坝的绿色高效延展,叠加出一出塞罕坝百万亩荒原变林海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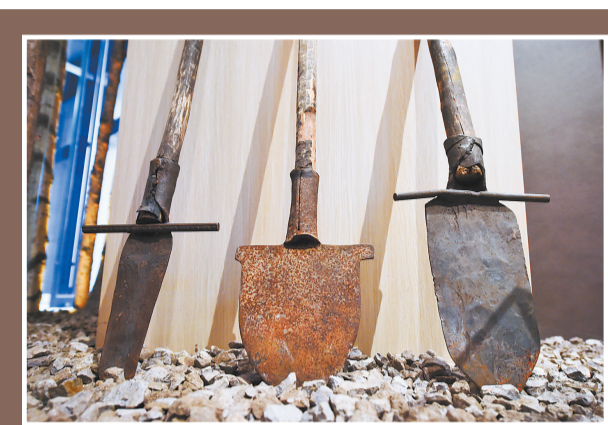
到2017年,塞罕坝整个林场只剩下1万亩石质阳坡尚未造林。

“在这样的山上挖树坑其实就是凿石头,一凿下去,震得手疼。”范冬冬说,坡陡山高,机械上不



2012年4月13日,李保国在临城县为农民讲解薄皮核桃嫁接换优技术要领。(河北日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塞罕坝展览馆陈列的三把植苗锹。

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八路军的母亲”李才清当年救助伤员所使用的麻绳。

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供图

去,浇水后重达七八斤的容器苗全靠人扛骡子驮,“就连骡子都经常累得撂挑子”。

在让第三代植苗锹也“败下阵来”的困难面前,塞罕坝人却向这“最后的硬骨头”发起了总攻。截至2018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攻坚战造林任务基本完成,造林成活率达到99%。幼树成林后,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场,森林覆盖率将达到86%的饱和值。

不过,植苗锹不会就此退出塞罕坝的历史。现在,为改变造林树种单一,丰富林分树种结构,塞罕坝正向着营造复层异龄混交林的目标迈进。

虽然现在塞罕坝大部分树种都采用容器苗种植,但塞罕坝的主要树种之一落叶松,仍要借助植苗锹来栽种。

三把植苗锹,见证了塞罕坝机械林场从何处来,又将继续见证塞罕坝走向一个更加高质量的未来。

跨界:一位博导的博士论文

2004年夏天,一位46岁的中南林业学院博士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红富士苹果优质无公害栽培理论与配套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

论文以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的红富士苹果为研究对象,用详实的数据,分析了产地环境、土壤和叶片矿质元素,主要栽培措施对果实品质的影响。

其实,当时他已是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这个人,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新“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

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当时的他作为博导,却要“自降身段”再读博士,这个决定令很多人难以理解。

然而,通过这位博导的博士论文,这位埋首脱贫攻坚一线的知识分子的初心,却愈发清晰。

1996年8月的邢台岗底,是这篇论文的起点。当时,这个太行山中南部的山村,刚刚经历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村里仅有的200多亩耕地全被大水冲成了河滩地,很多村民选择离乡打工,甚至有村民因秋收无望选择喝药自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保国作为省科技救灾组的一员,来到了这里。

在村里看了一圈,李保国看到了村后沟里的苹果树。

眼前的苹果树虽然没有被大水冲垮,但因病虫害严重,长势很弱。

从20世纪80年代起,岗底村便开始种果树,但由于没有科学的果树管理技术,并没能改变岗底村民的贫困面貌。

“你们要是相信我,我教你们管理苹果树。”

就这样,李保国“包”下了岗底村。当时的李保国,是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方面的专家。在前南峪,为了提高当地百姓绿山的积极性,他曾指导老百姓种果树,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扶贫之路。

不过,相比在前南峪,为了更大幅度提高果农收益,李保国暗暗定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在岗底生产出优质无公害的苹果。

虽然现在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已经提高到绿色、有机,但在20世纪90年代,无公害却是个很超前的概念。

而这个目标意味着,李保国又要从头开始。

“老百姓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他从不怕从头开始。”李保国的爱人、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郭素萍说,因为对于李保国来说,“学啥都是为了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

但这份担当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付出。

李保国的这篇博士论文近8万字,仅实际采集试验数据制成的图表就有70多个。

这些一手数据的来之不易,李保国的助手,他当年带过的研究生们再清楚不过。2000级研究生秦立者的研究方向是病虫害。有的小虫晚上活动,所以秦立者的研究几乎都得夜间上山,观察病虫害的活动规律,但几乎都是和师父、师母一起,“当时我半夜上山做我的课题,师父平时回保定上课,一有时回岗底也是半夜扎在山上做他的博士论文研究。”

虽然种果树是“半路出家”,但李保国的专业水平,常常令科班出身的同行都刮目相看。

从选配最佳授粉品种、给苹果套袋、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建立无公害病虫害防治方法、省力化修剪、果实品质检测,建立气调库和苹果采收加工等,李保国带着学生将涉及苹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李保国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当面告诉记者:“不管生态的、土壤的、肥料的、栽培的、生理的,一直到分子生物学的,从宏观到微观,从单项技术到宏观产品设计,我几乎都懂。”末了,他反问道,“要想干成事,不较劲还行?”

“当时他读这个博士,大家都觉得他不为评职称不为啥,何苦还要读博士,况且他还坚决要自己考,考上了上,考不上不上。”别人不理解,但郭素萍明白,“其实,他就是想实实在在在学点儿新东西。”

从1996年来到岗底,到2004年博士毕业,这篇论文凝结了李保国扎根岗底八年的心血。

但最为可贵的是,这篇论文没有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借助这篇论文翔实的试验数据,一系列的苹果管理新技术获得突破。通过大面积推广“优质无公害苹果规模化种植”,为“富岗”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最终荣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年,富岗苹果便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消费的升级,岗底苹果果品质量仍在不断提高。

岗底村民因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住上了楼房,开上了小汽车,过上了好日子,这份科技巨作被成功地“写”在了太行山上,把过去的“荒山秃岭”变成了岗底人民的“金山银山”。

“为什么老百姓都说他出的招儿管用?因为这些招儿绝大多数都是李老师带着学生一点点做试验得到的结果,又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老百姓,再用‘盯死,死盯’的精神指导农民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秦立者说。

巍巍八百里太行,撑起了整个河北的骨架,也曾是河北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区域之一。

在河北脱贫攻坚的日子里,无数像李保国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把致富的火种播撒在太行,也将太行山走成了一条道路、一种精神。

(下转第十一版)